

红旗

HONGQI

一九六二年 10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十期 ★

目 录

社論：知識分子前进的道路…………… (1)

——紀念《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

无产阶級政党的革命傳統……………卞忠因 (7)

——讀列宁的《怎么办?》

严格要求和耐心说服相结合……………唐平铸 (17)

数学方法在認識客观世界中的

作用……………何祚庥 (22)

麦克米倫的碰壁和

“自由国家”之間的“合作紐带”……………張振亚 (31)

如此“就业机会均等”……………胡思升 (35)

☆ 五月十六日出版 ☆



社論

知識分子前進的道路

——紀念《在延安文艺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周年

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周年了。在這篇《講話》里，毛澤東同志結合我國革命文艺運動的實踐，創造性地闡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艺思想，深刻地解決了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根本問題，給文艺工作者指出了明確的方向和寬廣的道路。《講話》對於我國革命文学藝術的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二十年來，我國的革命文学藝術，一直沿着《講話》所指出的文艺為工农兵服務的方向前進，對整個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文学藝術是階級鬥爭的銳利武器之一。革命的文艺是整個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當文艺工作者明確地認識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們對自己所擔負的任務就會有更高的自覺，就會懂得自己前進的方向和重要的責任。他們要使自己的工作更加符合於革命的需要，就必須明確地解決為誰服務的問題。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談會上幫助文艺工作者解決的，正是這樣一個根本的問題，即為革命的政治服務，為工农兵服務的問題。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啟發和鼓舞了許多文艺工作者的自覺性、責任感和積極性，他們在這種啟發和鼓舞下，下決心深入工农兵群眾，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真地逐步解決這個根本問題。

文学藝術是整個文化戰綫的一個部門，它同其他文化部門比較起來，固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在一些根本問題上又有共同性。《講話》從整個文化戰綫的角度來分析文艺在革命事業中的地位 and 作用，提出為誰服務的問題，《講話》中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對於在其他部門工作的廣大知識分子，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為誰服務的問題，是一個世界觀的改造問題，是一切願意進步，願意革命的人們所必須解決的共同問題，毛澤東同志特別強調地把這個問題提到知識分子的面前。我們黨和毛澤東同志從文化工作在革命和建設中的地位 and 作用的分析出發，十分重視團結知識分子，同時給知識分子指出了前進的方向。《講話》指出，文化的軍隊“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在革命時期，我們要跟反動的文化作鬥爭，要建設自己的革



命的文化，就需要大量的拥有各种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建立自己的文化队伍。在一个由于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而文化落后的国家里，知识分子更加显得珍贵。所以，毛泽东同志总是告诉我们，应该尊重专家，专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三九年，党中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到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这更加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更加需要建立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知识分子越是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作用，越是明确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就越是能够更好地使自己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

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解放以前，我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那时，在我国知识分子队伍中，除了一小撮靠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并为他们服务的、反对革命的知识分子之外，其他知识分子，一般地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他们有一定程度的革命性。但是，他们的出身、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的世界观，又使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同工农群众有不同程度的距离。有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要求革命，甚至已经参加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革命运动，但是还没有真正解决自己的立场问题。他们在许多问题上还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因此他们就还不能够用自己的作品很好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对于他们说来，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就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当时，毛泽东同志指出，要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就要在行动中，在作品中，在灵魂深处，解决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就要清除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思想影响。否则，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虽然已经来到了革命的根据地，同革命的军队、革命的人民在一起工作，但是，因为对于工农群众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知心朋友，仍会发生同自己的环境和任务不协调、格格不入的情况。在全国解放以后，广大知识分子转到为新社会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同样有一个充分适应新社会需要，使自己的思想、情绪和工作真正密切地同社会主义的环境和任务相协调的问题。我们的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在这十三年来所经历的一个深刻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也就是要在根本上解决《讲话》所指出的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这种思想改造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的宣言指出，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中，“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是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之一。不坚持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注意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思想工作，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主张取消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不是促进知识分子革命化，而是放纵、迁就、迎合和利用知识分子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助长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感情，其结果，必然使帝国主义腐朽堕落的文化思潮得以传播，造成社会主义文化向资本主义文化蜕化的危险。在南斯拉夫，这种危险已经成为现实。

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有些革命的文艺作家，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他们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他们还不善于表现工农兵群众，他们所描写的工农兵，往往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革命的文艺作家和其他革命知识分子在有些事情上还有一些糊涂的观点，例如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他们之所以有这些弱点和这些不正确的想法，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彻底地、明确地解决他们的立足点的问题，他们还不能摆脱资产阶级思想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而加于他们的影响，他们还没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但是只要他们有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愿望，沿着正确的道路努力争取进步，并且得到适当的帮助，他们是有可能逐步克服这种弱点，改变这种不正确的想法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却把那种实际上只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的作品，吹捧成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范例；把那种实际上只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吹捧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新”成就。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这种论调只能堵死革命的知识分子的进步的道路，他们不是把知识分子引导到工人阶级的方面去，而是把知识分子引导到资产阶级的方面去，他们的目的不是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出发，实事求是地对待知识分子的长处和弱点，既看到他们拥有宝贵的科学文化知识，又看到他们身上存在着资产阶级影响；既热情地团结他们，发挥他们的长处，又诚恳地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逐步改变世界观。在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还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的这个原则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决不含糊，决不能有所迁就的。在知识分子中间，很好地进行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只会使我们的知识分子队伍在思想上更加健全起来和巩固起来，使我们的知识分子能够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会损害他们的才能和妨碍专业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知识分子转移立足点的任务，是要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的过程中，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地实现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工



农兵群众，也就是深入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创作源泉中去，这是提高创作质量的根本保证。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思想，又有助于文艺工作者正确地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因而就能更好地进行他们的创造性的文艺活动。由此可见，改造思想既是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又是文艺工作者本身的迫切需要。在其他方面工作的许多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工作中，也常常有接触群众的机会和必要。例如，许多社会科学家需要向群众作调查，许多自然科学家需要总结群众的生产经验，依靠群众去考察许多自然现象。他们完全可以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工作，和工农群众互相熟悉起来，逐步地在思想感情上同他们打成一片。我们的知识分子在真正做到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时候，工农群众的需要就会推动他们的业务工作，激起他们研究和解决某些问题的坚强决心和毅力，也可以使他们更好地尊重群众的经验，从中吸取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马克思主义学习得越好，思想感情改造得越彻底，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们的业务工作会做得更有成效。所以，转移立足点的任务，和他们本身的业务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

把思想改造同提高业务密切地结合起来，是贯穿在《讲话》中的一个重要精神。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是为了使他们的主体适应革命的环境，以便解放才能，发挥才能，使英雄有用武之地，创造出为人民群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出现了许多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好的作品，就是许多文艺工作者在这个精神指导下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以及各方面的知识分子要求自己既有先进思想，又有真才实学，这种要求是很好的。文艺工作者有了先进的世界观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又有较高的艺术技巧，就有可能在创作中逐步做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科学工作者有了先进的思想，又有真才实学，就有可能为人民的事业作出更为有益的贡献。所以，改造思想和提高业务并不是对立的，我们要善于把两者结合起来。当然，“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不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去代替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不对的，同样，离开业务的提高只谈思想的改造，也是错误的。我们既不要做无灵魂的文艺家、科学家，又不要做空头的文艺家、科学家。

人民内部的思想改造，归根到底是一种自我改造。自我改造主要是依靠自觉。当我们自己深深地感觉到思想改造对人民的事业、对自己都有益处，是自己确实需要的事情，就会积极主动地进行这个改造，并且可以使这个改造收到良好的效果。自觉的自我改造当然并不排斥而且欢迎和要求别人的帮助和批评。在这里，谁也不是单纯的“改造者”，或者只是“被改造者”，而是大家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教育者必须受教育。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所说的改造，首先和主要是对共产党员作家讲的。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作为世界的改造者首先要



对自己进行改造，然后也有责任对其他人民群众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工作。对于我们的所有革命干部来说，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也是一刻也不能疏忽的问题。一个革命干部，只有当他具有坚定的群众观点，懂得群众的心，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时候，他才能密切地联系群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做好工作。那些曾经在革命烈火的锻炼中，比较深刻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同志，现在仍然有不断巩固和提高的任务。新干部就更加需要努力实现这个思想感情上的根本变化。所有的革命干部，想问题、做工作，都要设身处地想到群众的需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同群众商量问题，从各方面克服自己身上的那些脱离群众的因素，正确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讲话》中提出的问题，不仅对于从事文化工作的干部，而且对于所有的革命干部，都是应该时刻注意的问题。

认识事物是一个过程，改变自己的认识也是一个过程。尤其是改变世界观，更需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并且是逐步变化的过程。认识的变化，思想的改造，是逐步深入、循序渐进的。这个过程中有许多小的质变阶段，积累起来，才能达到一个根本的质变。这中间又可能有曲折，有反复，有参差不齐的情况。因此，对于改变世界观的问题，要有足够的重视和长期努力的决心；要逐步前进而又不断前进；要不断巩固、提高，以免中途停顿，甚至倒退。在这里，决不能采取简单急躁的态度，强求一律；对于自己和别人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应重视，作为继续进步的基础。总之，对于这样的复杂的精神世界的活动，是十分需要耐心和细致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对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特别是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能用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在清除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和政治影响的斗争中，要严格划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在人民内部，又要严格划清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我们要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依靠大家的努力，在文艺界和学术界像在其他各界一样，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文艺和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以利于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以利于更好地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促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在思想改造中，怎样互相启发自觉，怎样做到既是严肃的诤友，又是热情诚恳的知己，适合于解决精神世界问题的特点，《讲话》给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我们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完全是以朋友的态度来同作家们进行亲切的谈话、商量和讨论。他生动地说明了改造思想感情、转变立场的必要性和在改造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矛盾和斗争。他总是首先实事求是地肯定成绩，提出积极的努力目标，然后细致地、尖锐地指出一些文艺工作者身上的缺点和问题，进行令人信服的分析 and 说理，鼓励他们向前奋斗。他既深刻地解决了一些根本



的原則的問題，又細致地解決了文藝活動中的一些具體問題，並透過對於這些具體問題的分析，幫助文藝工作者提高思想覺悟。他循循善誘地向作家、藝術家指明，他們應該如何既重視和群眾結合，又不要放鬆學習文化遺產，鍛煉寫作技巧；指明為什麼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到群眾中去，既是解決思想改造問題又是解決創作源泉問題的關鍵；指明為什麼越是與革命根據地的群眾相結合，創作出反映這個新世界、新群眾的作品，才越可能具有全國的意義；等等。採取這樣的態度，當然會受到廣大文藝工作者的歡迎。我們黨的工作者和知識分子自己，在幫助別人的時候，都應該學習毛澤東同志這種作風。

《講話》使我們看到，向革命的文藝作家提出嚴格的要求是十分必要的，同時又使我們看到，如果用粗暴的態度來對待思想問題，那是完全錯誤的；如果以這種嚴格的要求作為尺度，對於不合乎這種尺度的人採取排斥態度，也是完全錯誤的。《講話》中特別提到了文藝界的統一戰綫問題，根據當時的情況，黨的文藝工作者應該同黨外的一切主張民主、主張抗日的文學家、藝術家，而且應該同那些僅僅主張抗日的文學家、藝術家團結起來。小資產階級藝術家的思想和作品雖然有很多缺點，但是他們比較地傾向於革命，比較地接近勞動人民，所以也絕對不應該排斥他們，而應該把幫助他們克服缺點，爭取他們到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戰綫上來，看作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任務。二十年後的現在，具體的情況當然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文學家、藝術家，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知識分子，這個原則現在還是極為重要的。事實上，現在我們所能團結的文學家、藝術家和其他方面的知識分子，比過去是更加廣泛了。在廣泛團結的中間，對於思想上、藝術上的不同看法，要在團結的基礎上，通過討論逐步求得解決，不應該因此而妨礙團結和縮小團結的範圍。毛澤東同志說：“在一個統一戰綫里面，只有團結而無鬥爭，或者只有鬥爭而無團結，實行如過去某些同志所實行過的右傾的投降主義、尾巴主義，或者‘左’傾的排外主義、宗派主義，都是錯誤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藝術上也是如此。”這個指示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該忘記。

我國的文藝、科學在歷史上曾經有過輝煌的成就，我們有着豐富和寶貴的文化遺產，我們的知識分子也有着光榮的革命傳統。解放以來，廣大知識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業務上都有了很大的進步，對於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了寶貴的貢獻。在我國，已經逐步地形成了一支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隊伍，他們中間有從舊社會來的經過自我改造的知識分子，也有在新社會中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團結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逐步地壯大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的隊伍，是我們面前的重大任務。我們確信，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我們的知識分子一定會更好地按照《講話》指出的方向，按照又紅又專的要求，在已有成就的基礎上，繼續努力前進，提供出更高質量的精神產品，涌現出更多的優秀人材。我們的知識分子一定能夠在文藝、科學戰綫上，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更大的貢獻。



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传统

——读列宁的《怎么办？》

卞忠因

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是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根本问题。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经验证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缺乏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是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的党曾奋斗了半个世纪。恩格斯在一八八九年致特里尔的信里说：“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一八四七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无产阶级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①

巴黎公社之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心和领导下，欧洲各国相继成立了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即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这些党的建立，是无产阶级政党发展道路上的重要一步，它们曾经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积聚和团结无产阶级力量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第二国际各国的党是在和平、合法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二十世纪初，世界历史进入

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成为直接现实的迫切任务。在这“决定关头”，这些党却由于内部机会主义的发展，逐渐成为和平主义、议会主义的改良政党，它们不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要求来正确地解决新的革命任务，不能组织、领导无产阶级准备和实行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而远远落在日益增长的工人运动后面。革命形势迫切要求有一个新型的、根本区别于机会主义政党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

恩格斯逝世以后，以列宁为首的真正的革命派，为建立这样一个党曾同当时国际性的机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怎么办？》一书，就是列宁在六十年前（一九〇二年）所写的一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反对第二国际和俄国的机会主义的辉煌著作。我们不准在这里全面论述这部书的各种方面的意义，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列宁在这一著作中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思想，论证了无产阶级必须有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53年俄文版，第416页。



高度集中统一的、战斗的党，这个党应当成为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司令部。这部著作奠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思想基础。六十年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完全证实了列宁所发挥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思想的正确性。这些思想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六十年前，俄国正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由于它是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的焦点，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着“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要革命的任务”^{*}，因此，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战斗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问题更是迫切的问题。当时在俄国这样的党还没有建立起来。俄国的工人运动处于思想上组织上混乱、分散和动摇的时期，党在建立的过程中遇到了机会主义者的种种阻挠和破坏活动。列宁在这本书的结束语中做了这样的描述：“这个时期的英雄们所干的事情，与其说是直接否认‘伟大的字眼’，不如说是把它们庸俗化；科学社会主义已经不成其为完整的革命理论，而变成了人们可以‘自由地’把各种德国新教科书里的液体渗进去的混合物；‘阶级斗争’的口号不是推动人们向前去从事日益广阔、日益积极的活动，却成了安慰人心的手段，因为据说‘经济斗争是与政治斗争有着分不开的联系的’；政党的观念不是号召人们去建立战斗的革命家组织，却成了替一种‘革命的官样文章’和‘民主’的儿戏作辩护的口实。”

经济主义是这个时期混乱和动摇的主要

思想根源，是当时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要障碍。俄国工人运动中的经济主义，是伯恩斯坦主义的一个变种。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迎合和代表落后工人的要求，反对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意识，把工人运动和党的任务限制在经济斗争和仅仅在政治上支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方面。他们漠视和贬低革命理论的作用，要求“自由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各项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诬蔑为“教条主义”，而自己却醉心于机会主义的时髦宣传。他们为当时工人运动的混乱、分散和动摇的落后状态辩护，不承认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能够首先从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经济派的这些主张，实际上等于使工人阶级在迫切的革命任务和强大的敌人面前解除武装，是当时俄国工人运动的最大危险。为了结束混乱和动摇的状态，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革命的党，就必须首先同这个机会主义派别进行斗争，批判他们的各种错误观点，和他们在思想上“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胜利地执行了这个任务。

二

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派的根本分歧，首先在于对“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的不同估计，在于对“群众自发运动的

^{*} 凡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或转引自《怎么办？》一书。见《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作用这个基本問題”的不同看法。

俄国的革命运动从十九世紀末开始，出現了一个广闊强大的群众性高潮。这个高潮不仅来得迅速，而且席卷了新的地区和新的居民阶层，青年学生、一般知識分子、农民群众，都在工人运动影响下活跃起来了。当时的問題是：群众运动的高潮在繼續不断地、前后相承地增长起来，“但是革命家無論在自己的‘理論’工作或实际工作方面，都落后于这个高潮，沒有建立起一种連續不断的、前后相承的、能够领导全部运动的組織”。当时的运动还是自发性的运动。

所謂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就是群众还处于不觉悟的状态，他們虽然已經感觉到自己同厂主、同个别資本家的对立，并起来进行斗争，但他們还只是看到自己眼前的經濟利益，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利益同整个資本主义制度的对立。因此，他們的斗争仅仅是工联主义的斗争，还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政治斗争；也就是說，他們还没有真正的阶级觉悟，还没有社会主义的意識，因此認識不清自己的远大目标和历史使命。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自然应当为尽快地消除运动的自发状态、提高群众的自觉性而斗争。群众的自发斗争越是高涨，就越需要提高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觉性，以便领导和提高这个斗争。列宁在当时正是这样做的。但是，經濟派在他們的报章杂志上却赞美运动的自发性，責难列宁“輕視发展过程中的客观成分或自发成分的意义”、“夸大思想的作用”和夸大“有計划的自觉成分”的作用，說什么“人們因經常

想不忘政治理想而抹煞了运动的經濟基础”。在他們看来，工人运动的目的不过是追求一些狹隘的、眼前的經濟利益，根本没有什么长远的利益和远大目标。他們說什么“对每一个卢布工資增加一个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切实而可貴”，說什么工人进行斗争时，“应当知道他們現在的斗争不是为了什么将来的后代，而是为了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儿女”。因此，他們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根本不負有提高群众自觉性的任务，根本不應該对工人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應該对工人运动实行有目的有計划的领导。他們认为党的任务就是“随着党的发展而发展的过程”，即跟着工人运动做尾巴。列宁指出，正是这样一个“自觉性同自发性的关系問題具有很大的普遍意义”，对自觉性和自发性的作用的不同估計，反映了馬克思主义者同經濟主义者之間“各种理論分歧和政治意見分歧的全部实质”。

經濟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是认为，純粹的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規定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他們认为，从所謂工人經濟斗争的内部，即仅仅（或主要是）从經濟斗争出发，仅仅（或主要是）根据經濟斗争，便可以发展工人的阶级政治觉悟，便能够生长出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識。列宁說，这是极大的錯誤。工人經濟斗争本身并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意識，这种意識只能从外面灌輸进去。因为社会主义学說是一种科学，是工人阶级利益和斗争的科学表现，它只有在总结工人运动經驗的基础上，在深刻的哲学、历



史和经济的科学知識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工人阶级从自己的经济地位出发，虽然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说，它比别的阶级更容易领会社会主义理论，因为这个理论最深刻最正确地指明了他们受苦的原因和出路。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包括学习和研究时间及知识水平等条件的限制），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需要的某些法令等等的信念，而不可能自发地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科学的社会主义意识，或工人的政治觉悟，“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

事情不仅在于工人阶级单靠自身力量不能形成社会主义意识，事情还在于，如果崇拜自发性，轻视以至反对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的意识，即不对工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那在实际上就是在工人运动中帮助资产阶级传播他们的思想影响。列宁说：“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的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末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没有中间的思想体系……”。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

为什么工人运动的自发的的发展，就有受

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呢？这是因为，在私有制社会中，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它经过了全面的和精细的加工，并拥有众多的传播工具。因此，虽然“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然而最流行的（而且时时刻刻以各种形式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却自发地而又最厉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列宁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具有极其深刻的、重大的意义。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事情是这样：就是在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只要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还严重存在，外面还有帝国主义思想的包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仍然有可能“以各种形式复活起来”。在后一种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已经确立，但是人们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识仍然不可能不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教育而自发地发展起来。这里仍然存在着两种对立思想体系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的每一阵地，都必须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自觉斗争才能巩固和扩大。

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历史使命，就是用革命方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彻底消灭阶级，把世界最终引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就是对于这个根本利益和历史使命的科学说明。恩格斯说：“完成这个解放世界的事业，——乃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研究这一变革的历史条件及其实质，因此，也就是使负担着完成这一事业的使命的现在的被压迫阶级理解自己事业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



理論表現的科學社會主義的任務。”^①

工人的政治覺悟、工人的社會主義意識，首先就是他們對於自己的根本利益和歷史使命的認識。只有對資本主義進行全面的政治揭露和政治鬥爭，只有不局限於經濟鬥爭而把政治鬥爭提到首位，才能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這種鬥爭才稱得上是真正的社會民主主義的鬥爭。所以列寧說，工人的政治覺悟只能從經濟鬥爭範圍外面灌輸給工人，工人只有從各階級的政治關係方面才能吸取到科學社會主義的知識。自覺性同自發性的關係問題，其核心正是關於政治和經濟的關係問題，是這兩者究竟誰居于首要地位的問題。

經濟派從崇拜自發性的觀點出發，歪曲地引用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有決定作用的原理，認為在階級鬥爭中經濟鬥爭比政治鬥爭更為重要。他們說：“各個階級的經濟利益在歷史上有決定作用，所以無產階級為自己的經濟利益而進行的鬥爭對於它的階級發展和解放鬥爭應當有首要的意義”。

關於這一點，列寧同經濟主義者和一切形式的經濟主義傾向作了尖銳的鬥爭。列寧批駁他們說：“從經濟利益有決定作用的原理中，決不應當做出經濟鬥爭（即工會的鬥爭）有首要意義的結論”。馬克思主義者並不輕視經濟鬥爭的意義，它是全部階級鬥爭中的重要一部分，但是不能夸大這種鬥爭的意義。在社會歷史中，經濟是基礎，是決定因素，它歸根到底決定着政治等上層建築。但“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列寧說，一個階級的“最重要的‘有決定作用的’階級利益

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革來滿足；例如，無產階級的基本經濟利益只能經過用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革命來滿足。”俄國經濟派的觀點，即放棄工人運動的政治任務和政治目的觀點，不過是伯恩施坦所宣揚的“運動就是一切，最終目的沒有什麼”這一臭名遠揚的公式的直截了當的表現，這種觀點是完全叛賣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的。

“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②——列寧認為這是一個普遍原則，不論在革命時期，或者在建設時期，都是對的。列寧在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適時地把經濟建設任務提為黨和無產階級的中心任務，並且曾經提出過“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經濟”的要求，反對一切政治空談。但列寧反對對他這一思想的任何歪曲，他後來聲明說：“我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希望我們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經濟。但是不難理解，要實現這種願望，就必須不發生政治上的危險和政治上的錯誤。”^③ 他認為，“全部問題就在於（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也只能在於）：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處理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解決它的生產任務。”^④ 這裡順便提一下，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者在他們的《綱領》中標榜什麼“社會主義不能使人的個人幸福服從任何‘最高目

①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3頁。

②③④ 《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列寧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2、74、72頁。



的’”，这也就是要求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了个人眼前利益而忘掉自己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在新条件下的复活。

经济派还用“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骗人词句来掩饰他们的改良主义实质。列宁说：“所谓‘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句漂亮话，听起来虽然‘极端’深奥，‘极端’革命，其实则只是包含着力求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的那种传统的倾向！”经济主义者并不是否认一切政治，他们只是把社会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的政治，把党的革命纲领降低为改良主义的纲领。经济派所说的“政治斗争”，仅仅是“向政府提出具体要求，要它实行种种立法和行政措施来反对经济剥削，消除失业现象，消除饥荒等等”。列宁说，这种争取政治改良的斗争，虽然可以作为一个开端和组成部分包括在革命政党的活动范围之内，但它还没有超出工联主义斗争的范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使这种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而绝不能以此为限。

经济派认为，阶级之间的任何冲突都是“政治斗争”，工人的“阶级斗争”就是为每个卢布多争取到五个戈比的斗争。列宁说：“‘经济派’只承认萌芽阶段的阶级斗争，而不承认它的更发展的形式。换句话说，‘经济派’只承认阶级斗争中的那些从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最能容忍的东西，而拒绝比自由派更进一步，拒绝承认更高级的、自由派所不能接

受的阶级斗争。‘经济派’就这样逐渐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工人政客。‘经济派’就这样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斗争概念。”^①这里所说的“萌芽阶段的”、资产阶级“能够容忍”的阶级斗争，就是仅仅（或主要是）争取经济改良和某些政治改良而毫不触及革命根本问题即政权问题的斗争，而所谓“更高级的、自由派所不能接受的阶级斗争”，就是以推翻旧的国家政权机构为目标的革命斗争。“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阶级斗争不仅属于政治范围，而且抓住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全民族的’阶级斗争。”^②

马克思主义者要求把自发的工联主义政治提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而经济主义者则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这概括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主义者“在政治斗争问题上的一切意见分歧”。

列宁说：“社会民主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它的任务不是消极地为每一阶段的工人运动服务，而是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给这个运动指出最终目的，指出政治任务，保护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工人运动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就会变得烦琐，并且必然会堕入资产阶级的泥潭，因为只从事经济斗争，工人阶级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成为其他党派的尾巴，背叛‘工人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一伟大道

①② 《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7页。



訓。”^① 列宁的这一段話，概括了他在同經濟派作斗争中所闡明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任务和作用的观点。

三

无产阶级政党要能担負起自己的偉大历史任务，它就必須是以馬克思主义理論武装起来的，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来的，有着高度理論修养和高度集中統一的党。脱离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原則和組織原則的党，不可能是真正的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

列宁在同經濟派作斗争中闡述了“只有以先进理論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的思想，他认为，“沒有革命的理論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在醉心于最狹隘的实际活动的倾向同机会主义的时髦宣傳密切地融合起来的情况下，必須始終坚持这种思想。”当时俄国实际运动的情况使理論工作的意义显得很突出：随着馬克思主义的广泛傳播，发生了理論水平的某种程度的降低；党还剛剛在形成起来，剛剛在确定自己的面貌，还远沒有同各种錯誤思想进行过清算，特别是，俄国革命有自己的特殊条件，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本国範圍内担負着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都沒有担負过的任务，它必須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国际經驗。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应当恢复和加强理論工作。一方面，必須坚持馬克思主义理論原則，保护党的思想基础的純洁性。他引用馬克思的意思說，“为了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可以締結条約，但是决不能拿原則来做

买卖，决不要作理論上的‘让步’。”另一方面，又必須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主义，拒絕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別国的經驗。

机会主义者“在要求由革命的社会民主运动坚决轉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运动的时候，也就同样坚决地轉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評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俄国的經濟主义者不仅“醉心于最狹隘的实际活动”，輕視和降低理論的作用，而且同西欧各国党的修正主义者一起，在“批評自由”的口号下，猖狂地攻击馬克思主义。他們把遵循馬克思主义理論說成是“教条主义”、“学理主义”、“党的僵化”等等。这是当时一場国际性的搏斗。列宁說：“目前（这一点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英国的費边社分子，法国的內閣主义派，德国的伯恩斯坦派，俄国的批評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們彼此称贊，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馬克思主义。”列宁把当时躲在“批評自由”旗帜下的人，叫做“公开的批評派和秘密的机会主义者”！这些机会主义者口中的所謂“批評自由”，究其实，不过是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偷換馬克思主义的自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灌輸到社会主义运动中去的自由；他們所“批評”的“教条主义”，并不是真正的教条主义，而正是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則，特别是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論原則。

俄国的“批評派”自称反对“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以修正主义的陈詞濫調来反对馬克

^① 《我們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9—330頁。



思主义的原理。他们自己就简单地照抄“最新德国药方”，以便为俄国隐蔽的伯恩斯坦主义辩护。列宁说：“这不是什么批评自由，而是奴隶式的……甚至是猴子式的模仿！”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真正反对教条主义的，当然不是俄国的批评派及其“一家弟兄”，而是列宁。

共产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的运动。这不仅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反对本国的沙文主义，而且意味着在年轻国家内刚刚开始的运动应当善于吸取别国的经验。但是，吸取别国的经验必须采取分析和批判的态度，不能囫圇吞枣地照抄别国的决议。“要真正运用别国的经验，单单了解这种经验或单单抄襲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要真正运用别国的经验，必须善于根据本国的情况独立地加以考查，在这方面决不能允许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当马克思主义经过欧洲人之手传播到美国去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地批评在美国的德国人不善于把自己的理论同美国工人运动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不善于使美国的党真正“美国化”，而是有意无意地使它“德国化”，以致脱离了美国群众。一八八七年一月恩格斯在给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且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愈是不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愈是通过他们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愈会深入到他们的心坎里面去。”^①

那末在俄国又怎样呢？列宁说：“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

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部分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② 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首先面对着一个欧亚两洲反动势力的强大堡垒——沙皇专制制度；无产阶级处于十分复杂的斗争条件下，合法活动的可能性很少；无产阶级必须和占人口中多数的农民群众结成联盟并成为农民的领袖，才可能有所作为；等等。列宁详细地分析了俄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条件，独立地探讨了和解决了俄国革命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虽然德国党在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具有最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无疑是国际工人阶级所共有的宝贵财富，但列宁反对用学究式的和教条式的态度把德国的东西硬塞给俄国群众（正好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把西欧的经验硬塞给美国群众一样），特别是反对照抄在德国党内已经受到批判的机会主义的教条，反对把科学社会主义这个完整的革命理论变成“人们可以‘自由地’把各种德国新教科书里的液体渗进去的混合物”。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运用它、发展它，从各个方面向前推进它，这样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列宁就是这样地为俄国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规定任务的。这个任务终于实现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53年俄文版，第402页。

^② 《我们的纲领》，《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7—188页。



成为各国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

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实现自己的历史任务，还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纪律的党。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①。无产阶级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是由党的性质和任务本身所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党只有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所团结的坚强的战斗部队时，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争取革命的胜利。

经济主义者在政治上崇拜自发性，在组织上也崇拜自发性。他们赞美当时存在的组织涣散、小组习气和手工业活动方式，为这些落后现象辩护。手工业方式是同经济主义直接有联系的，因为既然仅仅为了“同厂主和政府作经济斗争”，当然就完全不需要有（在这样的斗争的基础上也产生不出）一个全国性的集中的战斗组织。经济派心目中的无产阶级党，如列宁所说，不过是一个“专为工人经济斗争服务的‘执行组’”。

经济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在组织问题上的观点，就是反对民主集中制，反对党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主张党是一个组织涣散、成份复杂、没有定型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政党，可以是某种争论不休的俱乐部或分散各地互不联系的政治协会之类的东西。他们“把凡是主张建立向沙皇制度

坚决宣战的集中的战斗组织的思想都称之为‘民意主义’”，并且声称这种组织观点是同“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列宁批驳他们道，任何革命组织，如果它真想作严重的斗争，它就非有集中统一的组织不可。“只有集中化的战斗组织，坚定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而能满足一切革命本能和革命要求的组织，才能使运动不致举行轻率的进攻而能准备好有把握取得胜利的进攻。”集中统一的战斗组织并不同“真正的——不是儿戏式的——民主”相抵触，而只是同极端民主化和某种“原始民主”的概念相抵触。经济主义者在当时“非法”的秘密活动的条件下侈谈什么全体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广泛民主”，列宁说，这不过是“革命的官样文章”和玩弄“民主的儿戏”。

列宁针对当时党内严重的分散情况，还谈到了党对于全国斗争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在这里，他答复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他说：“有人担心：建立集中制的组织，结果会不会使重心从地方工作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呢？这会不会削弱我们同工人群众的联系以及一般地方鼓动工作，而使运动受到损失呢？我们回答道：近年来我们的运动恰恰是因为地方工作人员过分偏重地方工作而受到损失；因此，把重心稍稍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是绝对必要的；这种转移决不会减弱，而只会加强我们的联系和我们的地方鼓动工作。”

总之，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并且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

^① 《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0页。



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如列宁所说的，才是“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锋队”，而不是“机会主义者的后卫队”。只有这样的组织才是无产阶级胜利的保证。

* * *

列宁在二十世纪初为建立上述的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作的斗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伟大意义。列宁所为之毕生奋斗的是这样一个党，这个党以共产主义为斗争的最终目标，它从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全面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它有无产阶级解放世界的雄心壮志，善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把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把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和每一阶段的具体任务结合起来，善于领导群众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实现其最终目标。这样一个党是无产阶级事业的希望和依靠。没有这样一个党，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这样一个党，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这样一个党，就不可能领导全体人民最终地到达共产主义，也不可能在解放世界的伟大事业中坚定不移地执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

俄国的无产阶级正是因为列宁领导下建立了这样的党，才实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并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正是因为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光辉榜样建立了自己的新型的党，并且在自己的队伍中反对和肃清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影响，才使世界革命事业获得了像今天这样的伟大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建党思想的指导下和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建立起来的，它一开始就接受了列宁式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优良的革命传统，一般地说没有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传统。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坚决地反对了和纠正了自己队伍中的各种机会主义，不断地发扬了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各种优良传统，巩固和加强了自己队伍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从而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现在正在领导着中国人民不断地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今天，斗争条件更加复杂，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不论是已经取得了革命胜利的党，或者是正在争取革命胜利的党，都需要加强自己的战斗力，都需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无产阶级的国际经验。无产阶级的国内任务和国外任务不是轻松了，而是更加艰巨了。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面临着从现代修正主义方面来的危险。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攻击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他们要求把共产党从一个战斗的革命组织变成过去社会改良主义政党那种状态，使“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锋队”后退为“机会主义者的后卫队”。在这种情况下，重读《怎么办？》一书，使我们感到更加亲切和更有教益。我们应该从列宁的著作中吸取伟大的思想力量，保卫和发展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思想，反对任何形式的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为发扬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传统而斗争。



严格要求和耐心說服相結合

· 唐平鑄 ·

严格要求和耐心說服相結合，是人民解放軍的管理教育工作的—条重要原則。这条原則，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在革命軍隊中的具体运用，是毛澤东同志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論的具体运用，也是我党我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个优良傳統。根据这个原則，組織对个人，上級对下級，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無論在政治上、思想上或者工作上，都应该按照革命利益的需要，提出严格要求，不能降低标准，不能姑息放纵；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应该采取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不能采取簡單生硬的方法。就是說，必須用耐心說服的方法，达到严格要求的目的。这样—項原則，不仅对人民解放軍的管理教育工作是适用的，对其他一切部門和单位，也应该說是适用的。

为什么要严格要求呢？这在軍隊是显而易見的。軍隊如果沒有严格要求，每个官兵不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揮，千軍万馬就决不可能在—声号令下迅速准确地行动起来，就无法抓住战机，爭取战斗的胜利。机关、工厂、学校的情况，固然各有不同于軍隊的特点，但是在这点上也是大体相类似的。工厂

如果对每个工人不作严格要求，对他们生产上、思想上存在的各种问题，都听之任之，不聞不問，这样能够很好地完成生产任务嗎？学校如果不严格要求每个学生，对他们的学业和思想品德上的問題放任不管，这样能够培养出有用的人材嗎？我国有句老話：“严师出高徒”。这是很有道理的。

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在一个組織內的所有的成員，需要具有統一的意志和統一的行动。如果集体中的各个成員可以各行其是，这个組織就会像—盘散沙，决然不会有什么力量。所以，在一个組織內，必須要求所有的成員，严格地遵守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严格地执行上級的指示和組織的决定，严格地遵守各种規章制度和秩序，坚决地完成自己担負的任务。各行各业、各种組織，为了使群众有組織地行动，使工作有秩序地进行，行政命令和組織紀律無論如何是不可缺少的。許多人生活工作在一起，如果没有共同遵守的組織紀律，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混乱，更談不到有克服困难、取得成績的巨大力量了。毛澤东同志說：“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沒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維持，这是人們的常識所了解的。”^①因此，在一个組織內，每个成員都要受到一定的組織紀律的約束。我們所說的严格要求，正是这种組織性和紀律性的表現，它是和一切小資产阶级的自由散漫习气、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根本不相容的。小資产阶级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頁。



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一些人往往不习惯于有严格组织纪律的生活，不习惯于领导上的严格管理。所以，要做到严格要求，就必须和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不断的斗争。

组织对个人，上级对下级，作严格的要求，是对党和国家高度负责的表现，也是对同志、对下级的最大的爱护。要求严格，就可以帮助同志们得到切实的锻炼和提高，使他们更好地完成工作和学习的任务。如果平时要求不严，马马虎虎，一旦发生了问题，才来一次“算总账”，这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对同志、对下级不负责任的表现。

当然，我们强调严格要求，决不是说，可以不分问题的性质，不管事情的大小，一律从严，越严越好。无论在工作、思想或者生活的各个领域，总有原则问题和非原则问题、重大问题和一般问题的区别。我们指的严格要求，主要是对那些原则问题和重大问题而言的。对于任何一个干部，对于军队的每一个官兵，首先是要看他是否忠实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立场坚定，经得起严重斗争的考验；是否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和组织的决定，认真执行上级的命令、指示，积极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是否努力学习，力求上进，在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方面很健康；是否能够联系群众，不计较个人得失，坚持真理，坚持原则，顾全大局，服从整体；等等。一个组织及其领导者应该从这些方面严格要求同志，而不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都来“严格要求”。如果样样要求严格，结果一样也严格不了，并且还会束缚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仅如此，即使是一些原则问题和重大问题，对不同的对象也应该作不同的要求，不能千篇一律。例如，对党员要更严格

一些，对非党员要比较宽一些；对老干部要更严格一些，对老干部要比较宽一些。因为党员和非党员，老干部和新干部，他们的觉悟程度不同，他们在革命工作中应起的作用有所不同，实际能够达到的水平也有差别。我们决不能用同样的水准去要求各种不同的对象。如果不区别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问题，从一个框子出发，作同样的严格要求，那是不正确的。当然，这里说的宽一些和严一些，是比较而言，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说要求比较宽一些，决不是说可以离开原则。

应该怎样达到严格要求的目的呢？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要严格要求，就应该多下命令，少讲道理；多施批评指责，少进行说服教育；只能上级说了算，不容许下级提出不同的意见，甚至在态度上还要声色俱厉，等等。这是把简单粗暴的命令主义、军阀主义的作风和正确的严格要求混同了起来，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所说的严格，是要求上的严格，是处理问题的时候坚持原则性，而不是态度粗暴，更不是滥施惩罚。态度粗暴和滥施惩罚，这不是以平等待人的态度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的残余，是和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的身份根本不相称的。事实上，用简单粗暴的办法，也不可能达到严格要求的目的，不可能使干部、群众真正得到帮助，真正解决思想问题，最多也只能取得一时的表面的效果。因此，为了达到严格要求的目的，既要注意克服某些人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习气、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也要十分警惕某些领导干部的高人一头的思想，要反对用简单粗暴的命令主义的作风对待下级和群众。

我们党历来强调用耐心的说服教育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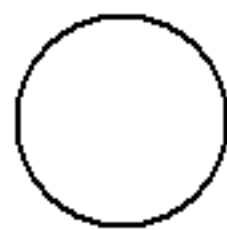
法,来达到严格要求的目的。毛澤东同志說：“凡屬於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於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①他又說：“為着維持社會秩序的目的而發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說服教育,單靠行政命令,在許多情況下就行不通。”^②為什麼人民內部的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而不能用強制的方法去解決呢?為什麼只有用耐心說服的方法才能達到严格要求的目的呢?這是因為在我們革命組織的內部,在人民的內部,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之間,上級和下級之間,幹部和群眾之間,官兵之間,在政治上是完全平等的。他們只有職務的分工,沒有人格的貴賤。在革命組織內部,在人民內部,也有矛盾,但是,這種矛盾,一般地說,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因此,解決這些矛盾,只能夠和只應該採用民主的、說服教育的方法,而不能夠和應該採用命令主義和強制手段。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解決思想問題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逐步接受真理的過程。這就需要領導者講清道理,以理服人。我們共產黨人是堅持真理的,正如毛澤东同志所說:“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是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③幹部和群眾是能夠接受真理的。只要把真理講清楚,就能夠啟發他們的自覺,就能夠有效地領導他們前進。同時,他們也只有接受了真理,提高了覺悟,才能夠在完成各項任務中,發揮高度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反之,如果不採取說服教育的方法,不向幹部和群眾講清楚各種正確的道理,批判各種錯誤的

思想,就不能夠真正解開人們思想上的“疙瘩”,使人口服心服,心情舒暢。因此,做領導工作的同志,在處理各種實際問題的時候,一定要進行耐心的說服教育,講清道理,說明意義,分析原因,指出辦法,啟發幹部和群眾的覺悟,提高他們的自覺性,使他們知道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應該怎樣做,不應該怎樣做。這種說服教育的方法,是毛澤东同志歷來提倡的工作方法,是我們黨的一種優良的傳統作風。

強調耐心說服,是不是放任遷就呢?如果把耐心說服看成是姑息遷就,對有缺點錯誤的同志不進行批評教育,甚至出了嚴重問題也不嚴肅處理,這是離開严格要求這一目的,對耐心說服的方法作了片面的、錯誤的理解。把严格要求和耐心說服對立起來,以為要嚴格,就不能耐心;表現了耐心,就不能严格要求,這是不正確的。我們是要通過耐心說服的方法來達到严格要求的目的。如果離開了严格要求,孤立地談耐心說服,就可能導致姑息放縱;反之,如果不要耐心說服,單純地講严格要求,也可能走向簡單生硬。严格要求和耐心說服,這兩者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在實際工作中要把二者結合得好,並不很容易。我們需要從高度的政治責任心出發,把這二者很好地結合起來。只有具備了高度的政治責任心,才能夠嚴格地要求每一個同志,而決不會姑息遷就,放任不管;也只有具備了高度的政治責任心,才能夠從實際效果出發,耐心地進行艱苦的說服教育工

①②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頁。

③ 《反對黨八股》。《毛澤东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36頁。



作，实事求是地解决同志们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而决不会发脾气，耍态度。

严格要求和耐心说服相结合的原则，对什么人适用呢？有一种意见认为，只是对易于说服的先进分子才适用，而对不易说服的人就不适用或者不完全适用。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党历来认为，在群众中，总有先进、中间、落后这三种状态的人。这种差别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存在的，而且永远都会存在。在领导工作中必须承认这种差别，善于对待这种差别。实践经验一再证明，严格要求和耐心说服相结合的原则，对于群众中的各种类型的人都是适用的和必需的。而且，对于思想越是落后一些的人，就越要重视运用这一原则。因为先进分子，自觉性比较高，一般地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即使有了一些问题，也比较容易说通。对于中间状态的人，就要多吃一些说服教育工作。在一项大的改革的开始，处于中间状态的人往往占多数。他们有一定程度的自觉性，但不如先进分子；或者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定程度的自觉性，在另一个问题上就不那么自觉。这就需要领导者耐心说服，启发他们的觉悟。至于对那些思想落后的人，领导者就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了。思想落后的人既缺乏自觉的约束力量，别人的三言两语又往往点不破他们。因此，对这部分人既要时刻注意严格要求，又要特别注意耐心的说服教育。我们应该相信，用耐心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帮助那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是可以推动和督促他们进步的。在革命组织中，在人民内部，人们自觉程度的高低，思想的进步和落后，是同旧社会对他们的影响程度，同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和自我努力分不开的。作为领导者，应该承认和看到

这种现实情况，以更大的注意力帮助那些进步慢的人，使他们在上级、同级和下级的同志们的帮助下，在先进分子的带动下，经过自我努力，以较快的步伐赶上前去。我们决不能因为某些人表现落后，就对他们丧失信心，嫌恶和厌恶他们，或者用简单粗暴和惩办主义的方法对待他们。有的人，开始也觉得对思想落后的同志应该耐心地说服教育，但是做了一些教育工作以后，没有什么效果，或者有了一点效果，过不久又旧病复发了，因此就对说服教育的方法发生了怀疑，不相信那些落后的同志能够逐步提高觉悟，认为非采取强制压服的手段不可。这样对待思想落后的同志，不可能达到帮助他们提高思想的目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①我们应该坚持这种正确的态度，反对那种对待落后的同志采取嫌恶、排斥、打击的错误态度。

还有一种情况，领导者三番五次地进行说服教育，但是被领导者并不能心悦诚服，或者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不通。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进行具体分析。首先，就要看领导者本身工作做得够不够，对问题的处理是否正确。如果领导者用以说服人的，只是一般的道理，不能“对症下药”，触动对方的思想深处，自然不会有什么说服力。说服人的工作，是一种艰苦细致的工作。领导者要说服别人，不仅要把情况摸清楚，摆事实、讲道理，把话说到点子上，而且要热情坦率地向对方交心，讲心里话，耐心等待对方的觉悟，一次谈话不行，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10页。



二次，三次。不仅要指出对方的缺点錯誤，而且要帮助对方分析产生錯誤的主客观原因，提出改正錯誤的方法；同时要注意表揚和鼓励对方的成績和进步。如果领导者对問題处理得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当然就不可能說服別人，更不能責怪別人固执了。有些人，虽然领导上一再进行說服教育，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見。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就應該特別認真听取和分析这些人的意見。如果分析的結果，证明这些人的意見是正确的，或者有正确的部分，那就應該本着服从真理的精神，接受这些正确的意見或其中的正确部分，改变或部分改变自己原来的意見。在这种情况下，那就不是批評別人固执和不听說服的問題，而是领导者自己进行自我批評的問題。毛澤东同志經常教导我們，要善于和意見不同的人共事。一方面，我們的革命事业要求我們有統一的意志和統一的行动，如果在我們的党内，在革命军队中，在一切的革命組織中，沒有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真正統一，就不可能有堅強的战斗力，去完成自己的任务。另一方面，在党内，在军队和其他一切革命組織內，总会有不同意見存在的，对任何問題和在任何情况下意見都完全一致，那是不可能的。問題在于如何正确地处理意見分歧。不仅对日常事务性質的問題上产生的意見分歧，而且对某些原則問題上产生的意見分歧，都只能夠和只應該采取充分展开討論的方法，而不能采取強制的方法去解决。如果有的人在一些原則問題上坚持自己的意見，只要他执行上級的指示和組織的決定，積極地完成自己的任务，那末，是可以允許他保留自己的意見的。如果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意見是对的，领导上就應該改变原

来的意見，按照他的意見办；如果他保留的是不正确的意見，那么，事实会教育他，促使他改正自己的錯誤認識。

強調說服教育，并不是不要紀律約束和必要的紀律处分。毛澤东同志說：“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須用社会主义的紀律約束自己。”^①某些时候，对某些人采取強制性的紀律約束和必要的紀律处分，这也是达到严格要求所必需的、正确的手段；但这仍然是建立在說服教育基础上的。为了貫徹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每个組織和每个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在处理干部和群眾的思想問題和实际問題的时候，必須既要严格要求，又要耐心說服，既要發揚民主，又要有紀律約束，使二者很好地結合起来，不要強調了一个側面，忽視了另一个側面。

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教育群众，必須先向群众学习。只有先当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俗話說：身教胜于言教。作为一个领导者，應該首先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則，处处做群众的模范，并且虛心地接受群众的批評和監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應該教育下級和被领导者，自覺地接受管理，服从领导。这两个方面應該很好地結合起来。这样，就能夠更有力地貫徹执行严格要求和耐心說服相結合的原則，就能夠充分調动群众的积极性，做好各項革命和建設工作，完成党和国家交給的光榮任务。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頁。



数学方法在認識客观世界中的作用

· 何 祚 庠 ·

在現代科学研究中，数学方法的应用将越来越普遍。这是一种极有发展前途的重要科学研究方法。

在科学史上，数学方法的应用要一直上推到十七和十八世紀期間的牛頓。牛頓发明了微分学，并把它应用到力学中，这就使得力学以及天体力学的面貌为之一新。十九世紀出現了一批专门在这个方面工作的科学家，如傅立叶、馬克斯威尔、玻尔茨曼等人。他們广泛地把数学解析应用到物理学各部門，在傳热学、电磁学、分子运动論等方面，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这样就获得了一个和“实验学派”相对立的名称——“数理学派”。此后，随着各种科学向定量的方向发展，数学也就获得多方面的应用。它不仅仅应用到一切称为“精密科学”的研究領域，而且还正在逐渐推广到生物科学、思維科学以及經濟科学的領域，并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本文試图分析一下数学方法所具有的某些特点，以及它在認識客观世界中的作用。

数学——認識客观世界的 辯証的輔助工具和表現方式

关于数学在認識客观世界中的作用，首先是恩格斯作了确切的評價。恩格斯在《自然辯证法》一书〔总的計劃草案〕中曾經指

出，“数学：辯証的輔助工具和表現方式”^①。恩格斯沒有完成《自然辯证法》一书的写作計劃，因而他对于这个提綱草案中的論点，并未能加以發揮。从恩格斯的这个論断中，可以看出数学的作用有两方面。第一，数学是認識客观世界的辯証的輔助工具。第二，数学又是一种輔助的表現手段，亦即是一种語言。

为什么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要把数学提高到作为研究客观世界的一种輔助工具、亦即是科学方法論这种高度呢？这首先是因为对于事物量的研究本身就是十分重要的方法論問題，并且数学还具有方法論的性质。恩格斯說：“数学是数量的科学”^②。又說，“純数学是以现实世界的空間的形式和数量的关系——这是非常现实的資料——为对象的。”^③量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范畴。一切事物都有质和量这两个方面。因而专门以研究量的关系为目的的数学，就会有广泛的应用。

为什么对于事物量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方法論問題？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領域內，有許多量的問題，本身就是头等重要的問題。不进行这种量的关系的研究，就几乎不能得到任何关于

①② 《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16頁。

③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頁。



这类事物規律性的知識。例如，在火箭技术的研究中，必須对燃料的裝載量及消耗率、推力大小的变化、結構重量及載重量、飞行的軌道等等因素作定量的研究，否則就不能准确地控制火箭的航行。又如在中子反应堆的建造中，必須事先对材料配置的比例，临界体积的大小，中子通量的大小，控制棒的作用等等作定量的計算，不如此，不仅不能使反应堆开动起来，而且还可能出严重的事。在基本建設上一个重要的原則是必須有正确的設計。所謂設計，就是要根据一定的需要，事先計算好材料、装备等等在空間的地位和数量关系。一个优良的设计，将为国家节省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国民經济計划的制訂方面，对于比例关系的計算，常常是头等重要的問題。不把各个生产部門間的比例关系計算好，那末就有产生比例关系失調的危險。由此可見，在許多实际工作中，都有很多极重要的量的关系問題。对于这些量的关系进行透彻的研究，会給工作带来很大的帮助。

第二，事物的质和事物的量总是以一定的关系而互相联結起来的。唯物辯证法中“从量轉化为质和从质轉化为量”的規律，就是研究质和量的关系的。事物的质总是通过一定的量来表现的。质的变化，只有由于物质或运动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发生。也就是說，要知道质，就要知道量。

毛澤东同志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曾特別強調要“胸中有‘数’”。他指出，“对情况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沒有数量也就沒有质量。我們有許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

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①。毛澤东同志的这段話，对于一切事物的研究都具有原則性的意义，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突出的精神，就是把对事物量的分析提高到方法論的高度，并且強調在研究事物的质时要和数量的分析相結合。

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里，这种通过数量来分析质量的方法是特別重要的。这常常表现在对决定事物变化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数量級”的分析上。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里，常常十分注意透过錯綜复杂的现象抓住决定事物实质的那些因素。用自然科学研究里常用的术语來說，就是要把所研究的事物的变化发展及各种因素形成一个全面的、定性的“物理图像”，从而根据这种“物理图像”来提出假說，制定进一步的工作方案等。經驗表明，“物理图像”的形成，常常是对各种因素进行“数量級”的分析的結果。离开了这种“数量級”的分析，就不可能真正形成一个有实际意义的“物理图像”。这也就是說，不仅仅是研究量的問題需要进行量的分析，在研究事物的质时，也必須进行量的分析。

数学本身还具有一系列的特点。

数学的第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严密的邏輯性。不論是初等数学或是高等数学，都是以邏輯推理的形式来表述量的关系和空間形式的。邏輯推理的特点是由这一命題推出另一命題，由已知的关系求出未知的关系。在数学上这种邏輯推理往往表现在数学定理的证明和方程式的求解上。数学定理证明的一

^① 《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43頁。



个特点是，它必須由已知公理、定理或引理中給出这个新的数学定理的证明。而数学方程式的求解，就是要利用已知的量的关系来求出未知的量的关系。正因为数学具有这种邏輯推理的性质，所以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它就常常被用来作为科学定理的证明的工具和求出未知量的关系的方法。

数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具有若干辯证的特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論》和《自然辯证法》等著作中，曾經以大量的篇幅来探討运动和辯证法是如何进入数学的。即使是初等数学，恩格斯也举出了許多例证說明那里也存在着許多辯证的特性。对于高等数学，恩格斯評論道：“在那里即使很簡單的关系，如抽象的量的关系、惡的无限，都采取了完全辯证的形式，迫使数学家們既不自觉又不自願地轉变为辯证的数学家”^①。恩格斯指出，高等数学中这些辯证的概念，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这种辯证特性的一种反映。所不同的只是在于：“一个是由人的头脑有意識地实现出来的，而另一个則是由自然界无意識地实现出来的”^②。正因为数学中存在着和自然界相类似的这种辯证的特性，所以数学也就能用来不仅闡明事物中若干較简单的联系，而且能用来探討自然界中某些較复杂的辯证的联系。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只有微分学才能使自然科学有可能用数学来不仅仅表明状态，而且也表明过程，即运动。”^③

恩格斯对于高等数学的辯证特性的分析，是針對十九世紀的数学而言的。現代的数学比起十九世紀的数学来，水平已經大大提高了。但由恩格斯所揭示的高等数学中的辯证的思想，仍然一直貫穿到二十世紀的数

学。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应用范围也是大大地扩展了。

数学的第三个重要特点是它的抽象性。数学在研究量的关系时，总是暫時地舍去了事物所具有的許多具体的性质，而抽象地探討事物的量。乍看起来，数学所探討的量是和具体事物无关的。然而它却是现实世界的空間形式和数量关系的一种反映，是从許多具体事物中抽取出来的一种普遍关系。因而反过来数学也就能在各种不同的領域內获得普遍的应用。

数学在这方面的特性，有点类乎辯证法。辯证法的規律是自然、社会以及思維运动的最一般的規律。辯证法的規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引出来的，并且以抽象的形式反映着事物所普遍具有的一些联系。因而反过来，辯证法就既是一种方法論，又是一門邏輯学。它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思維科学中能普遍的应用。当然，辯证法所探討的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維的普遍規律，而数学所探討的是空間形式和量的規律；辯证法是一切事物发展的邏輯，而数学只是一种量的邏輯。从这点說，辯证法所涉及的領域是更为广泛而普遍的。人們在研究数学問題时，固然常常是暫時地舍去了事物的质而抽象地考察量，但是，在应用数学方法来解决科学工作中的具体問題时，就不能只研究量而不探討质，不能脫离了质而只考察量。因而在应用数学于科学研究时，还要采用其他邏輯方法，如归納、演繹、分析、綜合、抽象、概括等，特別是要以辯证法作

①②③ 《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67、227、229頁。



为指导。正因为如此，从方法論的角度說，数学并不能和辯证法并列，它只能是一种輔助的方法。

数学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它是一种表达手段，亦即是一种語言。應該說，高等数学中函数的概念，用来描述物体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是再恰当也沒有了。至于函数和函数間的关系，亦即物体的这个状态和那个状态之間的关系，那末微分方程、积分方程等解析表达式便是表述这种关系最簡练的方式。假如我們試用日常使用的語言把电动力学的基本定律描述出来，那就可能写成一部长篇大論，还說不清楚它們的內在联系。而在电动力学里用了一个馬克斯威尔的偏微分方程，就把它最主要的特征都概括在里面了。对于那些更复杂一点的物理規律，只应用函数的概念还不足以表达出它們，因而还要用函数和函数之間的关系，亦即所謂算子来表达。例如，微观世界的物理量就是用算子来表达的。而微观世界的物理規律，如量子力学中的量的关系，就表示为算子和算子之間的关系。显然，对于这种物理規律，离开了数学的語言，就簡直无法精确地表达它們的实在的内容。

語言在人的思維活动中，起着重大作用。斯大林說：“語言是直接与思維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維活动的結果，認識活动的成果，用詞及由詞組成的句子記載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思想交流成为可能的了。”^①他又說：“不論人底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产生，它們只有在語言的材料底基础上、在語言的術語和詞句底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②由此可見，語言对于人的思維的发展起着极为

重要的作用。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里，正因为使用了这种明白而簡练的数学語言，才能使自然科学的理論研究有可能在这种語言的基础上走到很远的范圍。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精通和熟练数学的語言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所謂“精密科学”的領域內，数学是进入这些科学宝库的一把钥匙，不熟习这种語言，就几乎无法深入这些科学領域。

归結起来，数学在人的認識活动中的作用有二：第一，它是一种認識方法；第二，它是一种語言。它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起着重要的方法論的作用，低估了这种作用是不对的。

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

数学方法是理論思維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在自然科学中的实际应用有两方面：一是概括經驗材料，二是預測新的現象。具体說来，它包括下列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利用数学来分析和概括实验材料、經驗規律，并从中建立起唯象的、半唯象的模型理論或抽取出基本定律。

第二，从基本定律或模型理論出发，利用数学演算的方法，有时結合着若干实验材料来分析和解决各种不同具体条件下的具体问题。

前一方面的内容，其特点是由个别到一般，它以建立新的理論体系为目的。后一方面的内容，其特点是由一般到个别，它以应用現有理論解决实际問題为目的。在物理学中，第一方面的内容称为理論物理学，第二方面的内容称为数学物理学。实际上，这两方面

^{①②} 《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第 2 版，第 20、38 頁。



的內容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基本理論的建立常常是从解决具体問題开始的，而另一方面，檢驗基本理論的正确性，只有通过具体問題的解决才能作出判断。

但是，不論上述的哪一方面的內容，在应用数学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时，极为重要的是，必須严格遵循唯物主义的立場，科学地运用抽象方法和严密地进行邏輯推理，才能使数学方法获得有效的成果。具体說来，在运用数学方法于科学工作时，首先必須充分估計到实验材料对于理論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且在工作过程中和实验工作取得紧密配合。

恩格斯指出，“不論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領域中，必須从既定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須从物质的各种对象形态和各种运动形态出发；因此，在理論的自然科学中不能虛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就要尽可能地用經驗去证明”^①。

在应用数学方法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时，对于恩格斯的这个原則性的意見是必須加以重視的。

一般說来，一个理論問題的提出，总是从实验事实或經驗材料出发的。人們在使用数学方法来进行研究时，首要的是列出正确的方程式。数学方程式必須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否則就是一堆形式主义的游戏，成为沒有意义的东西。而数学方程式列得是否正确，必須由經驗材料来判断。

在数学方程式求解时，也仍然要进一步概括經驗材料。数学方程式求解时常遇到的一项困难，是数学問題的极端复杂。一般說来，对于极其复杂的数学問題，要想严格地

求解，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如果要真正地求出解答，就不得不将实际情况进行簡化，引进若干假定，略去一些次要的或不关重要的因素，从而近似地求出它的解答。但是不論是在理論模型中引进假定也好，在計算中利用近似表达式也好，或是深入研究一个理想化的典型也好，都是实际条件的一种抽象。这种抽象是否正确，必須由經驗，亦即由实验材料来判断。

数学問題的求解方法，也常常是在实验材料的启示下得到的。理論物理学家和力学家們常常是凭借物理的直观“猜”到数学問題的答案，然后再去实际地求解出来的。显然，对于一个事先已經“猜”到了它的答案的人，将更容易找出它的合适的求解方法。

在实际应用数学方法于具体問題时，保持数学的演算、推导和证明的严密性，也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不保持数学演算、推导和证明所必需的严密性，就常常会导出錯誤的結論。初看起来，要做到数学证明的严密性，似乎只要依照邏輯的規則就够了。然而单凭邏輯的規則并不能保证证明所依据的前提是正确的。而对于前提的正确性，常常要由經驗材料来判断。因而所謂证明的严密性，也仍然要依賴实验資料。

最后，由数学方法所导出的結論，一般还应进一步由实验来加以驗證，也就是說，“要尽可能地用經驗去证明”。

总之，在运用数学方法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时，紧密地保持理論分析和科学实践之間的联系是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忽略了这一方面，就常常得不出应有的結果。

^① 《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7頁。



数学方法的应用，一方面要以实验工作为基础，另一方面又对实验工作有重大影响，可以弥补实验工作的不足。

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里，常用实验来进行研究。实验方法具有以下一系列的优点：第一，由实验方法所获得的知識都是第一手的直接經驗，因而这些知識都是可靠的知識（除非在实验工作中有錯誤）。第二，在实验过程中，由于使用了仪器、設備，因而极大地扩展了感官所直接观察的范围。第三，在实验工作中，已包含“对未知对象的分析（一个果核之剖开已经是分析的开端），綜合（动物的狡猾伎俩）”^①。因而对于原始的直接观察說来，实验已經大大提高了一步。

然而实验工作仍有它的局限性的一面。实验工作只有在理論分析的紧密配合之下，才能取得重要的成果。

第一，实验常常要受到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例如，目前还不能用实验来研究白矮星状态下的物质；也还不能用人工方法获得能量在一万亿电子伏特以上的高能粒子。即使这种物质条件都已具备，但实验上还常常有一些技术上的困难，如杂质的影响不能完全驅除，外界干扰所造成的“本底”过大等等，因而从实验上常常并不能保证事物“表现在最精确的形态且最不受扰乱影响的地方去考察”^②。在实验过程中，虽然已包含对未知对象的分析、綜合，但是总不能达到思維抽象所能达到的高度。在实验室内，无法获得绝对滿足理想条件的惯性坐标，也不可能造出一部滿足可逆过程条件的热机。对于这类问题的解决，显然不可能由物质上来实现，只能由思維来实现。理論計算常常能摆脱物质条件的限制，这正是数学方法的一

个突出的优点。

第二，即使在实验上的各种技术问题都已经获得解决，利用实验方法有时仍然得不到合乎实际的知識。例如，在工程技术的领域内，常常用模型試驗来进行研究。然而，模型和实物总有尺寸大小的不同。即使十分注意实验材料的选择，尽量地滿足“相似律”，然而要把一个问题的一切相似条件都同时滿足，往往是很难做到的。因而，这种实验研究也不能完全地如实反映实际情况。但在某些情况下，当人們可以利用理論計算方法来严密地处理这些问题时，利用理論計算反而能比实验测量得出更可靠的結果。

第三，实验方法只有和理論計算結合起来以后，才更能发挥它在認識客观世界中的作用。經驗表明，实验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对于自然界中的一切現象作深入細致的研究。重要的是，要对認識过程中的关键性問題，亦即典型的現象作精細的研究。抓住了关键以后，便能收“举一反三”，“聞一知十”之效。怎样挑选出最恰当的实验，必須有賴于理論計算的指导。而理論計算之所以可貴，在于它常常能給实验工作指出新的途徑。实际上，不仅仅在实验的挑选上，需要理論的指导，而且在实验的安排上，也离不开計算。經驗表明，实验装置只有經過仔細的理論分析以后，才能做出最好的安排。

第四，实验結果常常只有在对它进行了深刻的理論分析以后，才能更发掘出它的意义。毛澤东同志曾經指出，“感觉到了的东

① 恩格斯：《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5頁。

②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頁。



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①。科学史上常有的情况是：有許多实验結果，在当时并不能正确理解它的意义，甚而有时还会反过来以为实验做錯了。只有当理論发展起来以后，才看出这个实验的真正的深刻意义。例如，在天文学的观察上，长久以来发现水星繞日运动偏离理論計算的結果。当时各种可能的修正都不能給予完滿的解釋。直到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論发展起来以后，才弄清楚这种和理論計算的微小偏差，原来是广义相对論效应的結果。又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們使用微波技术来測定电子的磁矩，結果发现了电子具有偏离当时理論值的“反常磁矩”。进一步进行理論分析，并做了很多計算以后，才了解到原来这是电荷的一种“重正化”效应所導致的結果。显然，这些重大的科学結論，不借助于数学方法，就不可能得出来。

第五，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論实验工作进行得如何深入，科学总不能停留在經驗材料的阶段。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經驗的自然科学收集了如此龐大数量的实证知識材料，以致在每一个研究領域中有系統地和依据其內在联系把它們加以整理的必要就簡直成为无可避免的。建立各个知識領域互相間的正确联系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但是自然科学因之便走进了理論的領域，而在这里經驗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能求助于理論的思維。”^② 科学史的經驗表明，这种在实验材料基础上的深刻的理論概括，对科学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人們常常能从这种概括中做出重大的科学結論。举例來說，在現代超声速流体运动的研究中，冲激波的現象起着重要的影响。而这种現象却首先是由

非綫性流体力学方程式所“預言”，然后再由实验“找出”的。无綫电电磁波也是首先由馬克斯威尔方程式“推导出来”，然后赫茲再由实验加以“证实”的。現在，这两种自然現象都获得了广泛的技术应用。

总之，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应用数学方法时，必須正确地解决它同实验的关系。只有将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有机地結合起来，才能多方面地获得科学成果。

数学方法的应用正面临新的飞跃

在現代化的工业、技术和科学发展的条件下，广泛地发展以数学作为研究工具的理論科学的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可以期待的是，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将出現新的飞跃。因为現代工业、技术和科学的发展，为这种研究方向提供了特別有利的条件。这些重要的因素是：

(1) 現代化的工业技术发展的一个总的趋势，是越来越走向高温、高压、高速、高强度和广泛地采用自动化。仅仅依靠感官的直接的經驗来发展这种新的技术是远远不够了。普遍的趋势是要越来越依靠于理論計算的指导。

(2) 科学实验室的規模变得愈来愈大，有些实验室設備本身就是大規模的工业装各。进行一个較重要的实验，常常要耗費很多的資金和人力。可以肯定地說，所謂卢瑟福的“悬絲、封蜡”的时代，已是不能应付目前的需要了。为了充分发挥实验設備的作用，

① 《實踐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5頁。

② 《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3頁。



避免設置實驗設備上的盲目性，不能不對實驗的目的性作多方面的探討。這就要愈加求助於事先的理論分析。

(3) 科學實驗室的建立已經普及到很大的範圍。比起十九世紀時期，只有少數中心地區才有科學實驗室的狀況，現在是多出很多了。特別是實驗技術的日新月異，使科學資料的積累速度已較前大為增加。這樣，綜合實驗資料的要求就愈來愈迫切。

(4) 現代科學發展的重要趨勢是日益走向定量的方向。若干在過去不能用數學來處理的學科，現在卻變成為以數學的計算為主要的研究工具了。例如，短期天氣預報的發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現代的短期天氣預報中，人們常常使用數值預報的方法，因而比過去單純憑經驗的預報方法的準確度大大地提高了。恩格斯曾對十九世紀的自然科學里應用數學的狀況作了評述。他指出，“數學的應用，在剛體力學中是絕對的，在氣體力學中是近似的，在液體力學中就已經比較困難了；在物理學中是試驗性的和相對的；在化學中是最簡單的一次方程式；在生物學中等于零。”^①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現在的狀況是：在所有的力學和物理學中，數學的應用已經絕對的了。在化學中所應用的數學早已超出了初等數學的範圍；在那里高等數學已應用得十分廣泛，並且發展出量子化學、化學流體力學等這種需要高深的數學工具來處理的學科。現代數學也開始進入了生物學，人們已經在嘗試運用數學來分析神經活動的規律、遺傳的規律等等。數學進入經濟和社會的研究領域，發展出運籌學這一新的科學部門。至於統計方法在工業管理中的應用，已經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了。數學還滲入了語言科學的

範圍。目前人們正在從事用數學來處理語言的詞匯和文法，以便把它們變成能用機器來翻譯的東西。數學甚至还滲入思維科學的領域，在現代的邏輯學研究中，由於引進了數學方法而發展出數理邏輯這一門新的學科。總之，日益和數學密切結合，是現代科學發展的一個極重要的趨勢。如果低估了這種趨勢的重要性，就會使我們落后於現代科學水平。

(5) 現代數學也正在日新月異地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數學領域，並將逐漸影響自然科學的研究。例如，概率論就是一門極有應用前途的科學，它是研究大量現象的一門科學，是研究具有多種隨機因素的自然現象的有效方法，而人們還只是剛學會如何把它運用到自然科學的研究中去。泛函分析也是有新的應用前途的科學，它是研究具有無窮多個自由度的物理系統的有力工具。它和理論科學中若干重要部門，如量子場論、量子力學多體問題、統計物理等門科學的發展密切聯繫着。現代數學還發展出若干超越古典意義下的量的關係的數學，如上面所說到的數理邏輯就是其中的一種。數理邏輯不僅在數理證明上有重要應用，而且還影響到電子計算機的研究。總之，可以預計的是，現代數學還將不斷地提供新的研究工具。

(6) 二十世紀的重大發明之一，是電子計算機的發明。由於電子計算機的出現，將給數學方法的應用開辟出一個全新的境界。可以毫不夸大地說，電子計算機將和生物學上的顯微鏡、天文學上望遠鏡的作用相媲美。而它的影響將遍及於一切可以用數學來計算的科學、技術部門。有些同志把電子

^① 《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9頁。



計算机譬喻作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重炮”，意思是說，“不发則已，发必有中”，这确是很恰当的。目前电子計算机的計算速度，一般已达到每秒万次以上，而新型的計算机却可以达到每秒百万次的水平。我們知道，由于現代技术的发展，在力学和物理学中，那些能由古典的解析方法来处理的綫性方程已經不能应付实践的需要。在許多情况下，那些綫性方程将由非綫性方程来代替。然而，非綫性方程的求解，一直是数学中最困难的問題，因而不能不限制了数学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可是在电子計算机中，这些非綫性方程，仍然可以用数值計算的办法来求解。即使对于那些极其复杂的方程式，它們带有十分复杂的边值条件，在过去，人們只能大量地略去一些次要項、甚至是較主要的項来近似地求解，或者根本不能求解的，而現在却可以用电子計算机設法求出它們的解答。因而人們在使用理論計算方法来进行分析时，就可以既把主要因素又把次要因素都一起包括在內，从而使得計算結果和实际条件高度符合。正因为这样，人們就可以利用电子計算机进行这种“紙上的实验”来代替实验研究，甚至比实验測量还要精确，并且还可以在不同条件下計算若干次，得出不同的方案进行比较，避免进行大規模实验研究时的很多麻煩。在理論研究的領域內，人們常喜欢用解析的办法求解。解析的式子能够表現出一般的規律，因而一下就能找出决定事物变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但对于这类問題，电子計算机仍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电子計算机对于做理論計算的人們，仿佛是添加了一种实验工具。因为电子計算机可以給出精确的数值

解答，人們可以利用这种精确的数值解答来形成“物理图像”，分析事物的內在規律性，并利用机器的計算結果来檢驗解析求解方法所取的近似的好坏。由于电子計算机的出現，还促进了新的数值計算方法的研究。例如，蒙特卡洛方法就是其中的一种。这种計算方法有計算程序简单、方便、实用等等优点，可以簡便地进行多重积分，求解极其复杂的边值問題，等等。总之，我們必須預見到电子計算机給理論科学所带来的新的变革。

(7) 十九世紀思維科学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唯物辯证法的出現。而“辯证法是唯一适合于自然科学現在这个发展阶段的更高级的思維方法”^①。显然，这种高级的思維方法将能使数学方法在自然科学中得到更恰当的应用。

总之，从以上的分析看来，在現代科学中广泛地使用数学工具，确是科学中的一种进步方向。在这个方向上，正面临着一个新的飞跃。从这个角度說，不論是在我国科学工作中或是我国的科学教育工作中，都应该估計到科学发展的这种趋势。特別是在学校教学中，不断提高学生对于数学技巧的掌握和訓練，是一个頗为重要的問題。这不仅关系到学生对于高深的理論科学的掌握，而且也牵涉到学生邏輯思維能力的訓練的問題。在教学中广泛使用数学工具，加强学生在数学方面的基本訓練，使学生的理論知識訓練得比較严格、比較深刻，才有可能在这种較深厚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創造，以便把我国科学提到更高的水平。

^① 恩格斯：《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5頁。



麥克米倫的碰壁和 “自由國家”之間的“合作紐帶”

· 張 振 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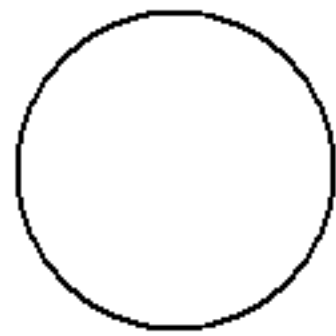
“在美國同歐洲的新關係中，美國的態度就像父母對子女似的”。

四月二十九日，英國《星期日電訊報》駐華盛頓記者用這樣一句啼笑皆非的話，談論白髮蒼蒼的麥克米倫遠渡重洋去同在年齡上是他的晚輩的肯尼迪會晤的事件。這位記者並作了這樣的注腳：“美國歡迎麥克米倫這位受到信任的老朋友的热烈情緒並沒有減少。但是像對從前的幾次英國首相訪問時的那種期望很大的氣氛，期望取得某種具體成就的氣氛，已經沒有了。”

這家報紙所說的英國不再受美國統治者的重視，是勢所必然的。因為麥克米倫是以“斗敗的公雞”的身份往見肯尼迪的。戰後以來，英國的政治、經濟勢力日漸衰落，英聯邦長期處於矛盾、渙散之中，這幾年與共同市場國家的角鬥中，英國又處於明顯的劣勢，它正在緊敲共同市場的大門，請求准予加入。在這種境況下，當年丘吉爾同羅斯福、艾德禮同杜魯門、甚至麥克米倫本人同艾森豪威爾那樣平等地會商西方大計的情況，自然是難以繼續維持了。麥克米倫四月二十五日飛抵紐約時，《紐約時報》就不客氣地說：“這位（英國）首相不能用前幾年的

權力說話了。英國本身現在已不再是過去那樣的國家了，它現在正在設法參加共同市場。因此，雖然這兩個政治家將作為平等者在華盛頓會晤，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肯尼迪處於比麥克米倫先生‘更為平等一些’的地位。”

不過，麥克米倫卻不會由於這類毫不客氣的奚落而退縮。因為他的訪問華盛頓是應肯尼迪的邀請，而非“不速之客”；更重要的是，他懂得雖然“肯尼迪比艾森豪威爾更準備蹂躪英國人的腳指頭”，雖然“美英聯盟”的概念已變得越來越模糊，但是從一定的角度看，美國今天所處的境地同英國相比，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因為西歐共同市場的崛起，正在成為對美國和英國的共同威脅；戴高樂正在歐洲積極地搞脫離美國控制的“第三種政治力量”，並要求同美英分享原子秘密；西德在對外政策上也同美國經常存在着矛盾，並力爭使自己控制原子武器。這些都是肯尼迪所感到棘手的。在華盛頓當局對西歐的控制越來越發生問題的時候，衰老的大英帝國在山姆大叔的眼中，仍不失為一個可以利用的“伙伴”。顯然，麥克米倫正是要投肯尼迪政府的困難之機，想重整旗鼓；爭



取恢复当年“美英联盟”的盛景。

麦克米伦所乞求于肯尼迪的东西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要求后者支持英国在进入共同市场后仍能保有它在英联邦的利益，以保持英国的大国地位，而不至降为一个普通的欧洲国家。用麦克米伦这次在纽约的讲话来说就是：使“英国能履行其既作为一个英联邦国家又作为一个欧洲国家的双重义务”。

但是要实现这个要求，却是十分困难。原来，英国同西欧共同市场“六国”（西德、法、意、荷、比、卢）的谈判，在今年夏天将进入最后阶段。按照共同市场条约的规定，英国参加进去以后，在对六国逐步拆除关税壁垒的同时，对外必须采用共同的统一关税。这样就同英国传统上用以维系英联邦关系的帝国特惠制发生了冲突。因为它要遵守共同市场对外统一关税的规定，就不能对英联邦国家彼此实行贸易优惠制待遇。显然，如果英联邦其他国家的工业品、原料和农产品不能受优待地自由进入英国市场，那么英国的出口货物也就不能受优待地自由进入英联邦其他各国。这就会使英国对外贸易（它的出口贸易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对英联邦国家）受到巨大损失。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英国在同“六国”的谈判中，一直要求共同市场国家也能同英联邦其他国家作出贸易特惠安排，以便英国参加共同市场后，基本上仍然保留它的帝国特惠制。但是，英国的如意算盘，却为一心想削弱英国的西欧国家所拒绝，它们只愿在英联邦的个别进口商品上考虑给予特惠安排，而且还只能是过渡性质。

英国如果不接受以上条约的规定，就不能加入共同市场，就要被隔绝于欧洲之外，失掉对欧洲经济和政治施加影响的能力，使自己的国际地位更加下落；如果要接受这些规定去加入共同市场，又舍不得丢掉英联邦。为了摆脱这种两难局面，麦克米伦不得不去面见肯尼迪，请求给予支持。而英国所愿意付出的代价是：在它参加共同市场后，为美国控制西欧的政策尽犬马之劳；例如，支持美国的大西洋两岸同时实行减税政策的主张，压制法国和西德过分醉心于成为核大国的“无理要求”，帮助实现美国拟定的欧洲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计划并使其受美国指导，等等。

但是，麦克米伦想在加入共同市场后保持英国同英联邦其他国家特殊贸易关系的要求，并未得到肯尼迪的“谅解”。英国《每日快报》报道，会谈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尴尬的场面：“（肯尼迪）总统对麦克米伦在英联邦问题上的不动摇的立场表示了一点……不耐烦情绪”。

为什么会出現这种不愉快的局面呢？原来拆散討厭的英联邦体系，不但是亟欲向外扩张的共同市场国家的愿望，而且也是华盛顿当局多年来求之不得的事。一直宣布要在对外贸易上开辟“新边疆”的肯尼迪政府，对于资源丰富的英联邦各国早已垂涎欲滴，随时找寻机会趁火打劫。英国《星期日快报》就曾指责说，在促使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问题上，美国一方面向英国竭力劝说放棄英联邦而同欧洲联合所能得到的经济利益，另一方



面实际上却在为自己夺取英联邦。现在麦克米倫要在这件事情上，求助于这位存心不良的“朋友”，这又怎能不碰壁呢？

不但这样，美国不肯答应让共同市場国家和英联邦国家之間作特殊貿易安排，还因为这种安排会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利益。肯尼迪政府正在由于共同市場国家加紧对农产品的进口作严格限制大伤脑筋，美国要保持它的农产品向西欧市場輸出本已困难重重，而現在英国的計劃如果实现，那么作为英联邦成員的加拿大和澳洲的小麦，将无阻拦地进入西欧，这就更会加重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困难，显然这是华盛顿所不願意的。

另外，如果英联邦的非洲热带国家同共同市場作出特殊貿易安排，将会使拉丁美洲国家在向西欧輸出咖啡、可可等原料时，处于极为不利的竞争地位，这种情况显然又是直接与美国的利益相关而为美国所害怕的。

美国和英国的这一矛盾就是这样的深刻而不可調和。因此，这次麦克米倫和肯尼迪进行会談时，肯尼迪对于英国在共同市場問題上的要求，不但不肯給予支持，甚至如合众国际社記者汉斯莱所报道的，他在会談中直截了当地用警告的口吻向麦克米倫表示，美国希望“英国加入共同市場的条件不会攪乱美国为了同这个新集团作出有利可图的貿易安排而进行的努力”。美联社記者糾利克也报道說，尽管肯尼迪和麦克米倫在会談中对共同市場这个問題的討論比其他任何問題为多，但是由于美英利益的冲突而未达成協議。

华盛顿当局这种对待英国的不友好行为，当然大大增加了英国的苦恼。不过，这决不是說，肯尼迪政府不急于要英国参加共同市場。相反，肯尼迪老早就主張建立包括英国在內的西欧的“政治和經濟一体化”，并不断施加压力，催促英国参加共同市場。因为把西欧的所有国家組織在一个区域性的机构內，一直是美国在战后对西欧的一项重要政策。美国要实现这样一个計劃，不但是为了防止帝国主义陣营內爆发革命危机，防止帝国主义陣营更加走向四分五裂，以对抗強大的社会主义陣营；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做非常有利于美国进行控制。美国在战后通过馬歇尔計劃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欧洲經濟合作組織，欧洲支付同盟，欧洲煤鋼联营，欧洲原子能联营等等，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为这个目的服务的。欧洲共同市場的建立之所以受到美国的积极支持，美国之所以要英国参加这个集团而不同意后者另立門戶，原因也在这里。

美国最近急于要英国参加共同市場，还有着更为现实的原因，这就是，西欧共同市場經濟恢复和发展的速度大大出乎美国的意料之外。今年年初，肯尼迪就惊呼：“欧洲共同市場的发展（向美国）提出了最大的挑战”。对于这种挑战的危險性，美国《讀者文摘》在一篇题为《共同市場对美国意味着什么》的文章中說得很明白。作者布鲁斯·汉契森写道：“毫无疑问，欧洲用它的成功的經濟管理已經向我們显示了清楚而现实的危險。美国第一次面对一个力量相等的世界市



場的竞争对手。欧洲的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贸易集团，如果使用限制或歧视性的关税，以及它的武庫中的所有各种经济导弹，就能够挫伤北美洲的经济。这个集团一旦同美国展开一场经济战，就能蹂躏世界市场，并使自由的联盟破裂，从而把未来双手奉送给共产主义。”

为了应付共同市场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形成的对美国的威胁，并防止它们脱离美国的控制，肯尼迪提出了一个建立大西洋联盟的计划来防止这些国家自立门户。为此，他在今年年初向美国国会提出了他的所谓“扩大贸易法”，以之作为一种谈判工具，要求在大西洋两岸同时减税，就是说，要拆除共同市场的关税壁垒。而美国要实现这些计划，就需要借助于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用它来冲淡共同市场国家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小集团趋势。于是，肯尼迪在叫嚷大西洋两岸必须同时降低关税否则就会两败俱伤的同时，竭力利用英国在加入共同市场问题上的两难处境，施加压力，迫使英国同它所不爱但又不能不去勉强结合的共同市场这个新娘结婚，以便美国从中渔利。美国的这种做法，既可以利用英、法、西德等国之间的重重矛盾，予以牵制和驾驭，防止“第三种政治力量”抬头；又可以乘机削弱英国，夺走它的英联邦，这真是一举数得的好买卖。

那么，西欧共同市场国家是否会乖乖地接受英国加入，并接受美国的大西洋联盟计划呢？这还要看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而定。

由于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错综复杂，共同市场国家在对待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条件方面是存在着分歧的，它们对于华盛顿当局，在军事和政治上仍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所有这一切都使情况复杂化，并有利于肯尼迪政府玩弄各种分化手段，继续保持它对欧洲的所谓领导地位。

不过，领导尽管是在领导，这个领导却一天天在动摇。

针对着肯尼迪迫不及待地要求英国加入共同市场，针对着美国政府焦急地要大西洋两岸同时降低关税和积极推行“大西洋联盟”的计划，共同市场国家已经在提出一些刁难。一向对美国“忠诚”的西德总理阿登纳，从来是表示欢迎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但是今年三月，阿登纳在巴黎接见法国《世界报》总编辑时却改口说：“太多的国家参加共同市场可能使这个集团‘爆炸’而成为某种巨大的经济单位”；英国是否“真正属于大陆欧洲”仍然是一个问题。他甚至同意戴高乐的这样看法：在“六国”和美国之间只能建立“合作”的关系，而“不可能简单地合并成为一个过大的联盟”。据合众国际社透露，最近阿登纳更表示反对英国作为正式成员加入欧洲共同市场，认为英国只能作为共同市场的一个联系成员。尽管事后阿登纳政府为了不愿把事情弄得太僵，因而对阿登纳的话又加以否认，但是，这并不能勾销掉西德同美国之间实际上存在的矛盾。路透社记者赫弗南就报道说，这事已引起华盛顿官员的“相当不安”；“某些观察家担心阿登纳可能支持



戴高乐而设法使西欧（不包括英国）实现政治联盟”。至于一直同美国大闹别扭的法国，它的反美情绪就更加突出。戴高乐一直在设法阻止英国加入共同市场，这已经不是秘密。另外，他还不肯把从阿尔及利亚撤回的两师军队交给北大西洋集团，不许美国把核弹头存放在法国，同时坚决反对美国的独霸核威慑力量的专横态度。

“加强工业化的自由国家之间的合作纽带”，这是华盛顿当局所一贯叫嚷的“外交总路线”之一，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不会因为他们的尴尬处境而停止对于所谓“合作纽带”的吹嘘，但是只要把这块金字招牌揭开，其内容之污秽丑恶即暴露无遗，因为这种所谓“合作纽带”本来就是帝国主义国家间尔虞我诈的产物。

如此“就业机会均等”

胡 思 升

近来，美国统治集团围绕国内的黑人问题，接二连三地吹起了一种动听的调子。

肯尼迪在今年一月的国情咨文里信誓旦旦地说，美国政府“主张在民权方面得到发展……（美国公民）不分种族和肤色，保证得到充分的平等权利”。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跑到非洲象牙海岸去，也吹嘘说，自从肯尼迪政府上台以来，被美国政府雇用的美国黑人的数目逐渐增加了，言下之意是，今日美国黑人的境遇，已非昔日可比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总统和司法部长的话又做了具体的补充。这家御用刊物在今年三月五日的一期中，特地刊登了一篇有关美国黑人民权的中心问题——就业的文章，并

且配以官方提供的统计图表和十七幅黑人就任政府职务的照片，煞有介事地大吹大擂起来。

文章的题目叫做“为了黑人：更多和更好地在政府中工作”。确实响亮！编者还用粗体黑字加上了这样的按语：“黑人进入政府工作的肤色限制已经废除。在肯尼迪总统的命令下，黑人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作，而且是更好的工作。”这篇文章像透露秘闻似地谈到肯尼迪进入白宫后的“首要事情之一”，就是着手研究艾森豪威尔政府任内白人和黑人的薪金分配比例，并且在他就任的第一年内下令贯彻“就业机会均等”政策。尽管白宫的这个御用宣传刊物竭力替美国种族歧视



的现状涂脂抹粉，但是，人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不难看出，它的吹嘘不仅没有能掩盖住美国垄断资本所培育的一整套种族歧视制度的实质，反而把美国统治集团的面目涂得更丑，抹得更黑了。

首先，这家杂志吹嘘黑人在美国政府部门中就业的比例大大增加，并说“联邦政府的高级官员已经下令增加政府部门黑人雇员的数目”。但是，美国统治集团在哪些部门中特别“关怀”黑人呢？人们看到，在就业比例上占第一位的是总务局，黑人占该部门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四，数目的确不少。什么叫“总务局”呢？这家杂志解释说，这是“政府为所属的政府建筑物提供看管或类似服务的‘家务性’单位”。原来如此！这不就是为政府大厦看门、擦玻璃、拖地板、开电梯、送茶倒水等等为“高等白人”低头弯腰的勤杂工作吗？说起来冠冕堂皇，美国政府的一个单位就业人数中的黑人比例已经增加到三分之一，但是，这部分黑人担任工作的情况，恰恰就是美国“公民权利委员会”列举的种族歧视的丑恶现象之一，即黑人通常是担任最繁重的粗活；这也恰恰是盛行种族歧视的美国南方各州在“就业歧视”上的翻版，即对黑人工人的提升，只能从“看管厕所”提升为“清洁工”。再如，这家杂志说，美国邮政部雇用的黑人，在绝对数字上占第二位，共计八万五千人。本来嘛，叫更多的黑人去分发信件和递送电报，跑跑腿，是无损于“高级白人”的统治的。黑人干的是粗活，挣的是低工资。在事实面前，这家杂志也不

得不承认：“今天绝大多数黑人集中在低工资的工作上”。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这家杂志所提供的关于黑人在“国防部门”的“就业”占绝对数字第一位的材料：有十万以上的黑人受雇于国防部当兵，“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黑人受雇数字”。然而，这与其说是“就业”，不如说是被美国统治集团雇用来充当炮灰更合适些。

总之，干粗活、做跑腿、当炮灰，这就是“为了黑人”，这就是所谓给予黑人“更多更好的工作”，这就是所谓“肤色限制已经废除”，这就是肯尼迪“就业机会均等”政策的“德政”！

以上这些，还只是这家杂志透露出来的黑人在政府部门“就业”的片断的情况，至于广大美国黑人失业的情况，它根本没有敢触及到。美国黑人工人大批失业，失业的比率大大高于白人工人失业的比率，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根据美国全国都市同盟的调查，在十二个美国大城市中，包括像芝加哥、底特律、费城、克利夫兰和圣路易这样的城市，黑人工人总人数中失业者的比率相当于当地工人总人数中失业者的比率的三倍。甚至肯尼迪手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在今年一月二十二日的一份报告中也被迫承认，美国在就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非白种工人不到劳动力的百分之十二，但却占失业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二和占失业十五星期以上的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四”。这种事实，再一次挑开了肯尼迪挂起的“就业机会均等”和黑人白人享受“充分平等权利”的遮丑布，从



一个侧面露出了当今美国种族歧视的真实景象。如果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宣传标题改为“为了黑人：更少和更坏的工作”，不是更贴切些吗？

肯尼迪之流的所谓消除种族歧视的高调和事实相去如此之远，人们不禁要追问一下，他们装做对黑人“关怀备至”的样子，到底居心何在？

美国国内种族歧视的种种丑闻，显然是不利于肯尼迪政府打着“攀亲戚”的旗号，向非洲推行它的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到非洲去“攀亲戚”的美国政府的一些要人，常因被人揭发“家丑”而弄得瞠目结舌、狼狈万状。就拿今年的一个例子来说，在二月八日的晚上，正当美国所谓“非洲十字路口”工作队副主任林赛·怀特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大学做所谓“各国之间的谅解”的诱惑人心的讲演时，听众就曾狠狠地将了这位美国头面人物一军；当时，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向他责问：正当美国本身存在着种族隔离和歧视的时候，怎么能够促进‘国际谅解’呢？这使美国的《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也不能不担忧：如果美国仍然不愿意让美国黑人得到比勉强给予的象征性的公民地位以更多的东西的话，美国就不能说服非洲的愤怒的群众，使他们相信美国的制度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狡猾的肯尼迪政府在掩盖和粉饰美国国内种族歧视的丑闻方面着实花了一番苦心，它所以在黑人“就业”问题上这样大做文章，不但是企图欺骗美国人民，同时也是企图欺骗非洲人民而想出的“应变”的花招。

但是，不管肯尼迪之流的骗术如何花样翻新，他们一手终究难遮天下人的耳目。事实是，除了黑人的就业问题以外，美国国内大量存在的种族歧视的事实，随时都在使他们的骗术露底。什么蒙哥马利城事件，什么“自由乘客”事件，以及层出不穷的殴打和侮辱非洲国家驻美外交官的事件，不都是肯尼迪政府上台后轰动世界的丑闻吗？美国国内的黑人群众和许多非洲人士，已经从这些事件中日益识破肯尼迪政府的虚伪面目。美国《纽约邮报》今年四月十日发表的密尔顿·维尔斯特的文章承认：“肯尼迪政府已经由于黑人领袖们（对它）加紧抨击而开始感到刺痛”。这个作者说，黑人团体的一些发言人指出，在一九六〇年的选举中，许多黑人曾经由于肯尼迪对他们许下诺言而支持他，但是他们对肯尼迪一直没有实现这些诺言越来越不满。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劳工秘书赫伯特·希耳今年四月初指责说，美国政府关于在同政府订有合同的企业中禁止种族歧视的计划，“在宣传上捞到很大好处，但是在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方面只有表面上的、象征性的结果”。一位非洲国家驻美国使馆的参赞愤怒地说，美国“现在一方面在无休止地谈论平等，可是另一方面却明目张胆地实行种族歧视”；他强调说，“我不相信这个国家”。

事实俱在，肯尼迪之流的“给黑人以更多更好的工作”之类的鬼话，究竟能值几文钱呢？肯尼迪竭力掩盖和粉饰国内种族歧视的丑行，结果只能是欲盖弥彰。

